

“阳光下的守护”·法治文苑

我们都是法治宣传员

□ 赵春莉

站在窗边，向外望去，黑压压的一片，雨势越大了。打开窗的瞬间，雨滴越发肆意地冲破纱窗。我正和同事感叹着，这场雨什么时候才能停时，电话突兀地响起。

接起电话，是一位群众求助。当我说可以打报警电话时，对方却执意要求我们对他的父亲说一句话。了解得知，老人加入了一个披着“云养经济”外衣的非法集资养猪特别项目。我和同事在电话中劝说老人，但是老人一再表示，他曾和老伴们参观过养猪场，不用自己养，就可以挣钱，可以云端看养猪，还能吃上新鲜的猪肉，怎么可能是骗人的。

我们和老人的儿子沟通，希望他尽快带着老人来一趟公安分局。挂断电话后，我联系经侦大队，让专业的部门解决专业的案件，才更有说服力。

当天下午一上班，老人如约而至，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五位老人，据说都是打算一起养猪的老伙计。六位老人让我们先不要说话，而是每个人都打开了自己的手机，一边举着手机一边说：“我投了10万元，你看现在账户上已经挣了近3万元钱了。”另一位大爷也举着说：“我投了30万元，你看，都有近10万元的收益了。”

经侦大队的陈队长看着争先

恐后进行展示的老人们，只是笑着问：“我只想知道，你们所谓独立账户的钱，可以取出来吗？”一句话，就让所有人都噤了声，因为他们确实取不出钱来。

随着创业创新环境的变化，各种打着网络新概念和新型营销旗号的项目，采取虚假、夸大宣传的方式以及潜在的高额回报诱惑群众参加。陈队一一列举了不同的案例情况，当诸多案例摆在面前时，几位老人才真正意识到，他们陷入了投资陷阱中。

回到家，我和公公婆婆说起了这件事。对于退休老人而言，有钱有时间，最容易成为不法分子侵害的目标。其实，不管传销还是非法集资，也不管骗子如何变换手法伪装自己，群众只要是相信了低投入高回报的诱惑，就已经走向了不法分子的圈套。公公婆婆越听越觉得有道理。于是，我也在家中开始了一场小小的法治宣传，防止老人误入歧途。

以非法集资来讲，多是采用直接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的形式，可划分为债权、股权、商品营销、生产经营四大类，其具有三大特征，一是通过注册公司，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号召，由传统的种植、养殖向工程项目、科技开发、投资入股、消费返利等方式转化；二是将非法集资与传销、合同诈骗

手段等经济违法犯罪行为交织在一起，采用传销手段对集资人员进行洗脑，以种种优惠条件和获利模式，层层下套，引诱集资；三是举办各种活动，并在现场兑现红利，让参与者先尝到甜头，在活动时“现身说法”，以小利拉拢，让其拉着其他老人加入其中。提到此处时，婆婆若有所思地开口询问：“你说现在听课给鸡蛋、送礼品是不是也算？”我点了点头说：“怎么可能天上掉馅饼，不过是通过这种方式销售东西，如几万元的床垫、几千元的枕头，都是在变相地套取老人手中的钱。”

婆婆颇有感触地说：“你说的没错，我上次参加的一个讲座，让我第二天再去，如果拉新人一起去的话，不光新人有奖励，连我也会白得一袋鸡蛋。”我问：“如果我也想去听可以吗？”婆婆听了，头摇得像拨浪鼓。她说：“那可不行，你们太年轻，人家就要岁数大的。”

其实，如今受到非法传销和非法集资侵害的家庭并不少见，有的家庭意识到受骗后来到了经侦大队报警，老人泪流满面，一辈子的积蓄付诸东流。公公婆婆也说起，张姨家、王姨家也是，被骗了好几十万元，家人一夜之间愁白了头，主要好多还是借的钱。

这时婆婆站起身说：“你把你说的这些，给我编辑编辑，发到我的手机上，我明天去公园

打球跳广场舞时，宣传宣传。”公公也表示，他下去下棋时，也会给老伴们宣传宣传，让不法分子骗钱的心思成为妄想。

我一听，更开心了，因为公公婆婆参与其中成为宣传者，才更具说服力。我将陈队长那取的经，整理了几段话，发到公公婆婆的手机上，还把从经侦大队拿回来的新型传销活动和非法集资、反诈的风险预警提示宣传单交给了公公婆婆。

次日下班回到家，家里早已坐了好几位叔叔阿姨。婆婆高兴高采烈地说：“我今天和你爸当了一次法治宣传员，他们都是来取经的，你再给讲讲。”

提问声和自述声时不时从屋子里传出来。我想，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大爷大妈们的力量更是无穷的，看着眼前叔叔阿姨们的神情，越发觉得能用法治的力量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是我们最该做的事。

这时，叔叔阿姨都乐呵呵地说：“你说的案例，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们不能总觉得吃盐比你你们现在年轻人吃米多，就不会受骗。我们也都听懂了，只要是低投入高回报的，就是在骗我们兜里的钱。以后我们都是法治宣传员，守好大家的‘钱袋子’。”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公安局北戴河分局）

星群爷走了

□ 宋胜利

我出生在1947年。四五岁的时候，父亲经常跟我说，咱们宋家有个在部队当干部的，叫宋星群，大号宋殿臣。论起来，我应该叫他爷。我由衷敬佩并引以为豪，总想见见他。

第一次见到星群爷是1968年。当时我通过天津市卫生工作队一年多的医学培训，刚刚回到村里当医生。一听说星群爷回来探家了，我特别高兴——终于可以见到我心目中的那个英雄爷爷了。

好一个英俊的星群爷——个头超过一米八，不胖不瘦，腰杆笔直，浓眉大眼，标准的美男子。那年他41岁，在68军202师当政委，我当年21岁。

星群爷平易近人，而且很健谈。得知我当医生还兼任民兵连指导员和宣传队队长，经常自编自导文艺节目时，便鼓励我一定要把文学创作坚持下去，并期待我的作品能尽快在各级报刊发表。

星群爷从部队离休后，他在任丘城里安家了。从此，我们的交往便多了起来，每次见面，我都会把近期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拿给他看，他看后总是赞不绝口并给予鼓励 and 厚望。后来，得知我有篇散文上了《人民日报》，有作品在全国获奖，他高兴得不得了，平时不喝酒的他硬是和我喝了二两小酒。

201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对88周岁的星群爷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采访，挖掘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星群爷1942年参军。那年春天，不知哪儿走漏了风声，驻扎在津保公路任丘金桥据点的四五十个日本鬼子和汉奸突然来到南畅支村，被挨个逼问，人们异口同声地说没看见、不知道。此时，鬼子在一个牲口棚里发现了没有隐蔽好的地道口。于是，有备而来的鬼子和汉奸便把两台抽水机接通了吃水井和

大水坑，同时向地道里灌水。半小时以后，地道里的积水已经半人深。这时，得到消息的区小队火速赶到，一进村就跟鬼子交了火。鬼子一看来者不善，立刻逃走了。这一仗，区小队打死了两个日本鬼子和两个汉奸。那些钻地道的群众中，有宋殿臣的胞兄宋殿荣。

这件事儿让小小的殿臣明白了这个道理：要保护家乡，保护亲人，只有拿起枪来跟鬼子干。第二天，他说服了父母，跟同村的三个孩子一起，边走边打，跑了好几个村，步行四五十里路才找到了区小队，软磨硬泡当了娃娃兵。那一年，他15岁。

1943年，宋殿臣被调到42区队（辖任丘、高阳、安新三县），给一营三连当通讯员，后来就参加了冀中军区统一部署的堂二里歼灭战。当战士们随强攻部队向据点推进时，宋殿臣和两名战友看到5个日本兵从据点逃出来钻进了外围一个农家院，便火速跟了上去。他们冲进院子，向5间房屋内一连投了十多颗手榴弹，5个鬼子全部“报销”，还缴获了5支枪和200多发子弹。战斗结束后，宋殿臣等受到了区队嘉奖，每人还配备了一支枪，16岁的宋殿臣从此在42区队出了名。

1944年秋后，宋殿臣入了党，年仅17岁。第二年春，宋殿臣被派往三排三班当班长，成了整个区队年龄最小的一名基层指挥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解放战争中，宋殿臣转战南北，经历了多次阻击战和攻坚战，屡立战功，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获得了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

晚年的宋殿臣是幸福的，他经常捧着一个个军功章，流露出无尽的感慨：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活下来的人，世世代代都不能忘记他们。

今年8月7日，宋殿臣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星群爷走了，我经常在同事面前炫耀的那个英雄的爷爷走了。他永远离开了我们，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树影成诗

程里 摄

（作者单位：丰宁满族自治县公安局）



想念首长王占山

□ 李建军

1991年12月，我报名参军，走进绿色军营，1999年2月，有幸被组织选调到原济南军区某团政治处担任宣传干事。

刚到该团时，我就在醒目位置发现几幅巨幅画像。这是该团历史上涌现出的在全国、全军叫得响的英雄人物，王占山就是这些英雄人物的杰出代表。他曾任该团团长，4次受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切接见，曾荣获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被朝鲜授予“一级国旗勋章”，2021年被中共中央授予“七一勋章”。从河南省安阳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光荣离休。

1999年下半年，部队在进行真抓实备训练，提出“首战用我，全程用我，用我必胜”的口号，做到时刻准备打，保证能打赢。为了拓宽形式，丰富内容，领导邀请王占山宣讲革命传统战斗故事。接送王占山的任务落在了我的肩上，我怀着激动和崇拜的心情来到安阳军分区。虽然我

们未曾谋面，但我一眼就从人群中认出了王占山。

他身着洗得泛白的军装，中等身材，精神矍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站如松，行如风，军人的气质十足，同时又显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手里没有拿任何演讲稿，更没有带文件包。本来我是想扶他，但他身手敏捷，行动自如地上了车。

在车上，我们相谈甚欢，得知他经常被党政机关、部队、学校、企业等邀请做传统教育。

在部队大礼堂，战斗故事已经融入王占山的血脉，他不用话筒，声如洪钟，声情并茂，出口成章，将官兵带入枪林弹雨、战火纷飞的战场。台下官兵没有交头接耳打瞌睡的，普遍反映过瘾、解渴，训练时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气。因为当时条件受限，非常遗憾没有留下任何照片、视频资料。

教育活动结束，我陪同王占山来到政治处主任葛学勤的办公室休息。一番嘘寒问暖之后，葛学勤非常谦虚地请教：“王老，我们信仰的是共产主义，天天在

讲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

王占山听后哈哈大笑，回答：“我当兵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是部队让我有了文化，我能讲出什么深奥的道理。但是，作为革命战士，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一生的追求。我当战士时，排长就组织讨论过这个问题，还表扬了我，说我的发言最精彩，贴近实际。”

于是，王占山就把排长组织讨论时的场景回忆了一下。

王占山参军时，部队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他曾随部队在四川一带作战。一次，排长组织政治教育，主题是“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要求战士逐一发言，畅想美好生活。大家畅所欲言，气氛十分热烈。

有的说，祝愿祖国将来能自主研发飞机、大炮、导弹，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国富民强；有的说，等全国解放了，退役回家能过上“三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幸福生活……轮到王占山发言，他说出了心里话：“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战友们听后，纷纷热烈鼓掌。排长说：“再想想，说得再好一点！”

住宿条件改变了，通讯方便了。当时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勉强改善一下伙食，平时就是高粱窝窝头、玉米糊糊，而且经常断炊，那就说吃饭吧：“一个星期吃一顿肉。”这下可把战友高兴坏了，掌声经久不息。

排长仍不满足，接着追问：“再说说！”

南方雨水较多，空气潮湿，衣服、被褥经常是湿漉漉的，人容易患皮肤病，尤其是香港脚、股癣。于是，王占山就从到穿衣上说：“一人发两双胶鞋。”

王占山的发言赢得全排官兵的热烈掌声，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憧憬的笑容。

这是我唯一与王占山近距离接触，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都受到了教育。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再也没能与王占山面对面交流过。在此，我衷心祝福老首长身体健康，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作者单位：武安市公安局）

大运河畔的根脉

□ 朱林林

大运河如一条青罗带般，柔婉又坚韧地绕过村庄。小村不大，人亦不多，却是我幼年与少年的整个天地。父亲母亲居住在这里，他们一生与泥土相伴，听鸡鸣而起，踏着晨露出工，日子朴素得如同土地本身的颜色。

母亲生于20世纪50年代，书念到四年级便辍学了。她一生未曾走出这方水土，却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她面孔微黄而瘦削，仿佛也如土地一般被岁月反复犁过。童年家贫，我常窥见她背过身去悄悄抹泪，低声埋怨父亲年轻时没学门手艺，只会土里刨食。然而泪水过后，母亲总又挺身站起，用行动教会我“付出才有收获”这土地般朴素的真谛。她终日劳作，身影在灶台与田地间辗转，那双被岁月磨蚀的手，如同土地皴裂的纹路，无声地传递着沉甸甸的期望。日子渐渐好转，母亲却依然俭省，将积攒的钱仔细包藏起来。我临行前，她殷殷嘱咐：“在外要踏实做人，把日子过好。”——此语不似豪言壮语，却如雨渗入干渴的心田，成为我日后穿行风雨的根脉。

父亲性情温厚，不似母亲那般严厉。幼时顽劣磕碰，伏在父亲宽厚背脊上回家的情景，至今每每浮现眼前，心头便悄然生出一股暖流。一次失手打翻滚水，灼烫的痛楚如烙铁加身。父亲慌忙抱起我，深深自责竟狠狠抽了自己两耳光，那沉闷声响至今犹在耳畔。随后他背起我，几乎踏遍十里八乡寻医问药。我常于父亲肩头昏沉沉睡去，他察觉后便缓缓蹲下，轻轻揽住我，任我多睡片刻安安稳稳。父亲背我走过的路，仿佛大地托举着种子，每一步都深嵌着无言的爱；他臂膀的温热，穿透岁月尘埃，至今

仍是我抵御世间寒凉最深的暖意。

儿时记忆里，乡野气息如母亲手掌般熟悉：泥土腥气混着青草香，再掺进爹娘烧饭时草木灰的烟味。而最难忘的，当属村中那块晒粮场。收获时节，那里成了我们孩童嬉闹的王国，追逐喧哗常盖过父母的呵责。这晒粮场上的全家的命脉。除去口粮，爹娘将大部分粮食卖掉换钱，小心翼翼地积攒起来——那是我通往书本世界的桥梁。为守护这沉甸甸的希望，父亲常与叔伯们彻夜看守粮堆，微弱的灯光在暗夜中摇动，守护着全家的饭碗。晒粮场上的喧腾与静夜守护的灯光，如同大地的呼吸，一呼一吸间，吐纳着庄稼人年复一年的期盼与艰辛。

如今大运河依然默默流淌，田畴依旧如画，而我的爹娘却在光阴里渐渐矮了下去。母亲双鬓斑白，皱纹深深，那是操劳与苦盼镌刻下的印记；父亲温和的笑容里，也增添了疲惫的痕迹。时间从母亲身上抽走水分，在父亲腰脊上添加重量——这无声的销蚀，是大地为哺育万物而默默承受的消耗。

我飞离了村庄，却总感到有根须在土里无声地牵绊。泥土的恩典，父母的爱，无声地渗入血脉，成了我灵魂的河床，在生命深处日夜流淌不息。原来父母本身就是这厚德载物的大地，他们并非如日月高悬照耀，却以最深的静默托举着我们人生——无论走得多远，回望之处，永远有那方沃土承托着我们跋涉的足迹，永恒而无声。

父母之爱，终归是大地般的静默；它无声无息，却以坚韧的胸膛承载我所有漂泊的足迹；它不言不语，却用最深厚的沃土滋养了我向上伸展的枝丫。

（作者单位：东光县公安局）